

蒋百里早年的思想世界*

吴仰湘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蒋百里受甲午战败和戊戌政变的刺激, 民族意识和革命思想相继萌发。他宣传西方民族主义的首要旨趣, 是唤醒国民奋起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而不在激励汉民族光复旧物的革命情绪。但他辨析“新民说”和立宪派的理论误区, 历数清朝压制改革、取媚外人的罪状, 倡言以暴力手段推翻“今政府”, 却与革命派殊途同归。及至日俄战争爆发, 他又由鼓吹民族民主革命, 一变而全力筹划抵御俄、日侵略的国防建设。蒋百里早年思想世界的多姿多彩, 可为今人认识清末留日学生界丰富多样的思想提供典型的案例。

[关键词] 蒋百里; 民族主义; 反清革命; 国防建设。

[中图分类号] K25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09)05-0031-05

Jiang Bai-li's Thought World during His Early Career

WU Yangxia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Jiang Bai-li's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came into being very early. When he propagated western nationalism, his main purport was not to bestir the Hans to revolt Manchuria, but to awaken the whole nation to resist imperialist. However, while discriminating Liang Qichao and other constitutionalists' theoretical mistakes, he proposed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by force, which reached the same goal with the revolutionari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Jiang shifted his standpoint from advocacy of democratic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to appeal for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multidimensional and copred world of Jiang's early thinking provides a typical cas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abroad in Japan during the late Qing.

Key words: Jiang Bai-li; nationalism; revolting Manchuria;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defense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 浙江海宁人, 留日时以创办《浙江潮》闻名一时, 此后以毕生精力从事新式军事教育和近代化国防建设, 是中国近代最为杰出的军事学家之一, 堪称中国资产阶级新型国防理论的奠基人。国内外学术界对蒋百里后半生的军事思想(特别是抗日思想)颇多研究, 至于他早年的生活与思想, 迄今为止未超出1948年出版的《蒋百里先生传》的粗糙描述, 着力张扬他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面^①。该书所据为蒋氏旧友多年后的追忆, 未与蒋氏著述进行比对、分析, 故其中有传闻之词、疑似之说。因此, 本文根据《浙江潮》所载蒋百里各种著译文字, 对其早年多

姿多彩的思想世界作一番梳理和探究, 大致描绘出他从民族民主革命走向国防建设的思想轨迹, 藉以改变现有关蒋百里早年思想记载和论述的粗疏面貌, 也为今人认识清末留日学生界丰富多样的思想增加一例典型的个案。

一 民族意识与革命思想的相继萌发

甲午战争爆发之际, 正在家塾课习儒经的蒋百里, 因替堂兄抄录《申报》上的时局论说, 偶然接触到经书和八股之外的新世界: “新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就是甲午战

* [收稿日期] 2009-08-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7-0270)

[作者简介] 吴仰湘(1970—), 男, 湖南溆浦人,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学术史。

^① 《蒋百里先生传》系著名报人陶菊隐撰写, 中华书局1948年出版。焦艳琴《留日士官生蒋百里》(载《日本问题研究》1996年2期)虽对蒋氏在清末民初的活动与思想作了专题讨论, 但文中内容几乎全是转抄许逸云编著的《蒋百里年谱》(团结出版社1992年)而据笔者查对, 该年谱实际上仍多承袭《蒋百里先生传》。

争。从此,刺激了我的新知识,我学会了看报。也在那时,平壤、牙山、大东沟、九连城、威海卫、刘公岛,这种地理上的名字,很熟的挂在嘴边。”^{[1] (附录1)}大清帝国败于蕞尔岛国,让他深受刺激,而接下来父亲的过早病歿和马关议和的奇耻大辱,使他悲愤交加,第一次经受巨大的“社会振荡”^{[1] (附录3)},可谓“家难国忧,椎心泣血”^{[2] (18)}。从此他刻苦攻读,于读书外留心国事,立志为国自效,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国防主张,实际萌芽于此:“因中日之战刺激甚深,慨然立大志,其一生国防思想及弃文就武之动机肇始于是。”^{[2] (18)}

1895年,蒋百里读到《公车上书记》、《普天忠愤集》等时务新书,益明时势,对维新救亡有所认识。因此,得知戊戌变法消息后,他毅然筹集川资、学费,进入上海新办的经济学堂。然而未及三月,经济学堂因戊戌政变而停办,他只好颓然返乡。新式学业的中断与经济上的损失,对于追慕新学家境贫寒的蒋百里,无疑是一场惨重的打击,如其回忆所说:“年十七,既毕业于家塾,是为戊戌,乃出沪上。时沪上学校方勃兴,学膳、零用月约五元,而我家之所恃以生活者,月四元之租金、岁六石之米也。当是时,茫不自知,以假于戚友者十元,住校二月,携《法语进阶》、《笔算数学》、《代数备旨》以归,事实所迫,无可如何也。”直到第二年获得进入杭州求是书院的机会时,他还因“上海之苦痛经验犹震撼于余心”^[3],一度犹豫难决。可以说,甲午之败给蒋百里的刺激是奋发图强,挽救民族危机,戊戌之变则初次给他带来了种族之恨,“公于此时再受刺激,其民族意识亦孕育不拔”^{[2] (20)}。

蒋百里就读求是书院期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中华民族再遭旷古未有之凌辱。他对清政府的腐败政治与媚外行径极为愤慨,因此常与院中激进同学偷阅违禁书刊,公开发表抨击时政的言论,甚至与人秘密组织社团。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义失败遇害后,激情难抑的蒋百里赋诗哀悼,被顽固的书院总理陆懋勋察知,不得不离开求是书院,转而东渡求学于异邦^{[4] (17)}。

到日本后,蒋百里眼界大开,亲见经过明治维新的东瀛小国欣欣向荣,反思中国的维新变法却半途夭折,不禁感触万千。他考入成城学校,结识志同道合的蔡锷,不久与梁启超建立师生关系,因此一度参加了《新民丛报》的编辑工作。他还与蔡锷、蒋尊簋、范源濂、吴禄贞等人秘密歃血誓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以死为期,至于用何种手段求达目的,则由人自择”^{[5] (1449)}。这是留日学生中成立较早的秘密结社,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是有其积极影响的。据回忆,就读成城期间,蒋百里还与蔡锷、邹容、刘成禺等人“课毕围炉,大谈排满”,诸人所谈后来成为《革命军》的主要内容^{[6] (140)}。1902年7月,留日自费生要求保送入读成城学校遭拒绝,吴稚晖等与清廷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蔡钧求助于日本警方,将吴稚晖等人驱逐出境。蒋百里对此极为愤慨,在年底中国留日学生改选干事的大会上,他揭发原任干事曹汝霖、章宗祥暗通蔡钧的不光彩行为,指其为留学界奸细^{[2] (22)}。这是他内心不满清廷的又一次公开表露。这年冬天,蒋百里还与叶澜、王家驹、张继、胡景伊、冯自由等人发

起成立“青年会”,倡言“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7] (100)},这是留学界中最早的革命团体。

1902年10月,蒋百里与原来是书院同学发起成立浙江同乡会,议决创办《浙江潮》他当选为干事之一,负责总理杂志事宜。此后直到《浙江潮》停刊,他把课余的精力都用于编辑、撰译文章。由他主持拟定的杂志章程共四章,对办刊宗旨、栏目、体例、发行、特色等作了明确规定,其中有三条旨趣立意高远,引人注目:一是力求将输入外来文明与发扬本国特性融贯为一,反对舍己芸人;二是“立言务着眼国民全体之利益”,企图将改造中国与先行建设浙江密切联系起来;三是重视启蒙开智,力图将救亡御侮落到实处^[8]。1903年2月《浙江潮》出刊,开卷一篇声情并茂、勉励国民发愤自强力挽亡国之运的《发刊词》就出自蒋百里之手。从第一期到第十期,他以余一、飞生等笔名,发表《民族主义论》、《国魂篇》、《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俄人之性质》、《真军人》、《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等论文、译作。他早期的思想,在这些文章和上一年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军国民之教育》中有较为完整的体现。

二 唤醒国民挽救危亡的民族主义宣传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外患的日益严重和清廷的日趋腐败,有识之士或者阐扬传统的夷夏之辨和宋明遗民思想,或者引介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形成一股波涛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潮,蒋百里是其中一位极具思想个性的杰出代表。

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是指一个民族的各个成员对本民族通过人种、历史、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而长期形成的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爱护,其政治层面的归趋是民族建国,即建立民族主权国家,实现民族自治。从蒋百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可知他与当时的民族主义宣传者一样,把握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本质。不过,他的民族主义宣传还有其迥异之处。

当时,革命派无论阐扬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思想,还是介绍法国大革命,其目的皆在辨别满汉之异以论证革命排满,蒋百里却未在种族或文化的层面上讨论“异异种”的问题,而是着眼于全球范围内日趋激烈的民族竞争,大谈如何“合同种”,意在以民族主义为利器,挽救危亡中的祖国。他无论总结欧美各国凭借民族主义迅速崛起的历史,还是分析西方民族主义膨胀成为帝国主义的原因,揭示其积极向外扩张的趋势,目的都在给国人以启示和警醒:“今日欧族列强立国之本,在民族主义固也,然彼能以民族主义建己之国,复能以民族主义亡人之国……百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其势力遂一转悉注入于太平洋,而支那适当其冲矣。”他以时势危迫,倡言要救亡图存,只有立即引进民族主义:“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可见,蒋百里介绍西方的民族主义,是想唤醒国民奋起挽救整个中华民族的危亡,而不在激励汉民族光复旧物的革命情绪。

在论述民族建国的基本原则时，蒋百里虽然论及“一国不能容二族”的问题，但他仅就西欧民族运动而言，并未牵连中国的现实作任何发挥，并且始终关注国民素质与民族建国的关系。他分析种族的优胜劣败，主要取决于该族群在长期竞争中所造组织体即“国”的优劣，而国之兴亡又取决于该种族成员即“国民”的素质：“国也者，必视其国民之数之多寡、国民之力之强弱为比例。而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盖必其族同也，夫然后其国可以立，可以固，不然则否。”他所说的“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而形成的那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就是立国所必需的民族主义。他特别指出，处于异族统治之下时，能否建立本民族的国家，更与国民是否有民族建国意识密切相关：“国民必自认其建国之天职，自知国之为我有，始能于政治上关心其利害，而别结同族以建国。不然，则同国者同族可，异族可，我本与国无关系也。”他还说：“今日者，民族膨胀之时代也，内力不充，自相离乱，而适以处民族膨胀压力最盛之时代，是犹覆空杯与水而欲水之不入其中也，其可得欤？其可得欤？”“民族主义者，对外而有界，对内而能群者也。”他反对在“内力不充”的情况下“自相离乱”，又将民族主义的功能作明确的内外界划，可见他以民族主义为纽带团结全体国民以立国于群竞之世的意图¹⁹。

三 用暴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主张

蒋百里目睹清廷的腐败卖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严重危机，留意探讨“今日中国之亡，其原因果何在，而今日救亡之法，其道当何由”。在《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中，他开篇指出“新民说”和“立宪说”不适于中国的时势与事实，尤其未能“于中国群治组织上下适当之观察而得其根本”。他进而提出：“夫观一国之成败兴亡之大原，则视其智愚贤不肖之位置而已。贤智者在上，愚不肖者在下，群治组织之公例也。由其贤智之程度之高下、人数之多寡，而国之强弱以判焉。虽然即弱也，但使其组织之顺序，果能合乎群治之公例，则未有不可为治，未有不可渐致于强者也。譬之如树，树虽小，而枝叶、根本各得其所，未有不生长者也。”然而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下，贤愚之位置完全违背这一“群治组织之公例”，需要根本的救治：“若今日之中国，则枝叶入乎泥土之下，而根乃曝于空气之中，其位置既全乎倒置，此其所以根本腐败，而非有空前绝后之手段，不能救也。”这是他从清朝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严重弊病，得出只有推翻清朝统治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转弱为强的结论：“是故治今日之中国，更正其贵贱贤愚，为第一阶级，其次而后进不肖者使贤、进愚者使智之事，可得而言也，而后立宪议院之制，可得行也。”

当时的改良派特别是立宪论者，皆为清廷几纸诏书所惑，热望清廷惩前毖后，力行新政。对梁启超改造国民、移易风俗的救亡之方，蒋百里入木三分地指出其不切实际：“若以

今日之官吏、政府，任之而不革，而乃欲望民间有所改革，有所兴起，无论其无也，即有之，而独不思彼政府者，固日日以摧伤民气为第一政策乎？”对于力主效法日本实行宪政的立宪派，他指斥其言论中有“根本的谬误”，讥讽说：“独不思宪法未成以前之日本，亦犹是今日之中国昏昏在睡梦中乎？当夫庆应之末、明治之初，一二志士前仆后起，相与建革政之功者，此其人为何如人、此其事为何如事乎？岂以庚子以后之数道上谕，遂可冒之以大政维新乎？先辈未见有西乡隆盛，而今日之志士乃欲做伊藤博文乎？”当时立宪派反对激烈的排满革命，主张以和平方式争取清朝推行宪政，他痛责持此论者“不知今日政府之为何如真相”，并细加剖析：“夫政府今日，其所以宁断送此四万万财产性命于异族者，果何为乎？夫亦曰保稳其几只饭碗头耳。此四万万之性命财产，与此几只饭碗头相碰，乃以成今日之现势，其势之不能两立，盖可知也。……彼政府者，又乌知有所谓和平、所谓激烈乎？若曰有一物焉足以倒我之饭碗头者，必出死力以拒之。拒之有其辞，则曰叛逆。叛逆者何？倒饭碗头者是也，岂有定名哉！……独不见夫戊戌之变乎？其名则曰变法也，而杀之，杀之为其不利于己也。独不见夫庚子之变乎？其名则曰保皇也，而杀之，杀之为其不利于己也。夫变法也，保皇也，岂不和平也哉，而拒之若此！今之言立宪，以为我之说较革命造反为和平，而可以此动政府也，其亦知政府眼光中，又乌有所谓立宪、革命者乎？要之，此四万万之性命财产不去，则此几只饭碗头不保，如真欲救中国而求立宪乎，则政府视之，亦叛逆也。”可见，心有戊戌政变余痛的蒋百里，坚信为维护狭隘种族利益而不顾中华民族存亡的清廷权贵，既不会允许自下而上的改革，也绝不会切实推行宪政改革。

蒋百里还痛数清朝自甲午战败以来卖国媚外的丑恶行径，指责清廷“割地也，赔款也，矿约也，商约也，路约也，凡兹数端，无一事不可以使我世世子孙永失其立国之资格，而长为奴隶，永永沉沦万劫不复者也，而其罪恶之尤大者，尤莫如失信于国民，使之自生亡国之感”，由此得出“中国之亡，其罪万不能不归之于政府”的结论。因此他一再强调，要挽救民族危亡，不能指望朝廷变革自强，必须以暴力手段推倒腐败政府。他评论新民说时鲜明地指出，“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新民之道不在教育而在革命：“夫变俗之事，亦未始不可期，虽然，有其道也，则有一震撼雷霆之举，足以使沉睡之脑一震，而耳目能一新是也。”对不能担任新民之天职的“今政府”，他力主不必“教之以自新”，而要“思易而置之”，宣称与其“教之以新多数积重之民俗”，不如“教之以变少数短年易变之政府”。他又在指明日本以流血革命换来大政维新后，断言中国的改革如要仿效日本，势必遵循同样的道路：“必先造新政府，然后可以行新制度，断未有求旧政府，而可立新制度者也。”他还以其卓识对清末社会局势进行分析，预言立宪必将带来革命：“以今日小民生计之困难，政府财政之紊乱，而又种族之威深入人心，不许人以言论自由则已耳，苟许之，又何能止之？如是而一而二而三，未有不酿大乱者也。是故立宪者，大革命之媒也。”^[10]可见，与革命派费

尽心思构建“满汉种族冲突革命论”全然不同,蒋百里是由对新民说的评判和对立宪论的批驳入手,雄辩地得出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结论。

虽然蒋百里在宣传民族主义时不赞成排满覆清的民族革命,可是他引进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始终注意发掘其中蕴含的民主精神。例如论述民族建国问题时,他就对其中蕴含的民主政治作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条顿民族能组建“最善之组织体”,即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彼遂能发挥其本族之特性,合人民之权以为权,合人民之志之力以为志以为力,彼遂能力战群族而胜之,使其本族日滋长发达而未有已。”对凭借专制政治维系的非民族国家,他又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由分裂而强之统一,由统一而乃用专制,由专制而至于国民皆委弃其国。”追叙西方民族主义历史时,他更是认定“与自由有密切之关系”的近代民族主义不是起始于荷兰独立,而是根源于法国大革命,并对“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能相容”作了详细的论证,指出“民权之进一步,即为民族主义,而民权未发达,则民族主义必不能行”^[19]。他把民族建国直接引往建立一个以自由、民主为架构的近代民族主权国家,实际上已经提出民主革命的命题,其矛头同样对准了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清王朝。蒋百里1911年先后在奉天和浙江以实际行动支持辛亥革命,以及后来与梁启超、蔡锷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其思想根源就在这里。

四 创建国防军的主张 和防御俄、日侵略的国防建设

蒋百里因受甲午战争刺激,立志建设国防,赴日留学后,日本盛行的军国主义又让他心醉神迷,因此弃文习武,考进成城学校,继入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在成城学习期间,他编译《军国民之教育》,详细介绍日本推行军人精神教育和实施社会军事化的做法,多次以“译者曰”的形式,强调军人与国民密不可分,提出中国应仿行“全国皆兵主义”,建立武力与国民密切结合的国防武装^[11]。不久,他更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国防军的主张。他批评用于解决个人生存之争的私人军和用于维护君民之治的政府军,认为“固非用之于国内,而用之于国际”的近代军队才是真正的军队。他指出西方列强正全力建设对外作战的国防军,中国则情形相反:“世界各国之养军人也,其目的向外,中国之养军人也,其目的向内。”为此他提出“以军国主义为救中国之方针”,普及军国民教育,建立用于抵抗侵略的新式国民武装,从根本上改变“以军人为政府之私用物”和“以贱丈夫而欲与世界之爱国爱群之国民战”的落后状况,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2]。

1903年4月,因沙俄拒绝从满洲撤兵,强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暴露无遗,留日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钮永建提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叶澜、秦毓鎰等为了扩大青年会的影响,决定“借此一题目结一大团体,以灌输民族主义”,召集留日学生大会^{[7](P104)}。会议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旋改名学生军),准备回国参加对俄作战,并推选特派代表回国请愿,要求勿以东北为外人战场。这一御侮救亡的爱国之举,却被诬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的罪名,遭到清廷和日本当局的严厉压制。“青年会同志乃分向各省同乡会大倡革命排满之说,由秦毓鎰起草意见书,发挥民族主义,痛诋清廷之媚外虐民”^{[7](P107)}。极力反对“内力不充,自相离乱”的蒋百里,对留日学生中盛行的“不顾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13](P289-290)}的言论,显然难以赞同,他没有加入拒俄义勇队,更未参加以革命排满为目标的军国民教育会^①。鉴于民族危亡的岌岌之势,他批评新民之说缓不济急,又斥据势以立言的立宪派与据理以立言的革命派,说:“夫据理与据势,则两者各有壁垒,各有戈矛以相抗也,待此种议论争辩至极点,则我中国已不知何处去了。”及至10月28日俄军进占奉天省城,外患骤然增剧,他极感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当即表示要抛开关于新民、立宪与革命的文字之争,在《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的结尾写道:“吾作是,吾未竟也,吾之友汗且喘,以走告我曰:俄人占领奉天,而英而德而日而法,乃据俄人之故策以为请,瓜分之局定矣,而子犹以文字争,其可已矣夫,其可已矣夫!余闻之,神色虽不动,而其心犹上下颤动,其未已也。呜呼!此数千年之古国乎,尔终往矣,吾复何言,吾亦将随尔以往耳。”足见拒俄运动的挫折,特别是日俄战争的爆发,使蒋百里思想发生极大变化,由鼓吹民族民主革命,转而全力筹划抵御侵略的国防建设^②。

蒋百里很早就认识到“中国者,帝国主义之目的物也”^[14],但他心目中的国防对象,具体而言先是俄国,后是日本。他特别提醒国人,俄国虽与西方列强不可同日而语,却是威胁中国最大的敌人:“若是诸君以为今日之所可虑者,英耳美耳德耳日耳,若俄则向之所谓执土地侵略主义者也,且其商、工、政又不如英、美也,且其内政又非立宪,而君民之争又未亡也,况乎日英同盟,则其拒俄之意明矣,故俄欲蚕食东方,而英、日扼之,吾姑利用其猜忌之心,偷一日之安焉可也。呜呼!天下之钝且愚,未有如中国人之外交眼光者也;天下之浅且薄,未有如中国人之外交智识者也。呜呼!吾可知萨克之殖民地,将包山东、直隶而有之,而黑龙江、黄河之水将全赤,而我国民且将望北九叩首以大呼顺民也。”^[15]正因为对俄国的侵华野心洞若观火,他撰写了《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等文章,透视俄罗斯人种之性质,分析俄国外交手段之特点,评述其侵略政策之演变,揭露其吞并满洲、侵占华北的侵

① 冯自由指出:“军国民教育会与义勇队性质不同之点,后者属于拒俄御侮,而前者则属于革命排满,此其宗旨悬殊者也。义勇队既解散,学生之卑怯者,以畏惧政府干涉,不敢再预闻政治运动。”(《革命逸史(初集)》)第102页。按,蒋复璁《先叔百里公年表》、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许逸云《蒋百里年谱》等一致认为蒋百里曾与汪精卫、胡汉民两人同被推为拒俄大会主持人,与其思想实际不合。查检杨天石等编《拒俄运动》也无资料可以证明,应系回忆之误。

② 陶菊隐认为蒋百里留日时期一直大力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中“百里未参加任何党派,常以化名向《民报》投论文”;见《蒋百里先生传》第13页、《蒋百里传》第7页、许逸云《蒋百里年谱》第34页亦持此论。但据本文的分析,蒋百里不可能向1905年才创办并且以宣传排满兴汉为宗旨的《民报》投稿。

略野心和行动方略, 筹划抵御俄国的国防方案。例如, 英国记者赫威克在《俄人之性质》中, 预言“支那之满洲、蒙古、西藏必为俄人所得”, “吾恐不待今世纪之终, 而俄人之势力, 必直控东亚大陆而为其主人翁矣”, 蒋百里读后怵然心惊, 鉴于清廷当权派的一味亲俄, 他特意翻译全文, 并加上一大段“译者曰”, 其中说: “吾熟闻之矣, ‘知己知彼’。呜呼, 何吾中国人乃并此而忘之也! 吾又熟闻之矣, ‘天下之大患在俄’。呜呼, 何乃并此言而又忘之也!”^[16]他还分析甲午战争以来日俄之间从剑拔弩张到握手交欢的变化, 指出: “以日人之经济力薄弱, 苟欲与俄战, 则不得不并全力以从事于军备而倾注于北, 然西欧之势力滔滔贯入于支那南部者, 必将日益盛, 而日人将无容足之地矣, 然则日俄之胜负未可决, 而南方之利必坐失, 可预知也。日人今日之侵略政策不出两途, 曰南进、曰北进, 然北进则强俄横其头, 南进则病夫当其下, 若之何不不移其难而从事于易也?”^[15]这一分析主要基于俄强日弱的判断, 但他高估了俄国外表之强大及其外交之阴险, 低估了日本的实力与其侵占东三省的野心, 因此他关于日本必南进而北进的预言, 很快就被日俄战争所否定(不过 30 年代日本面对强大的苏俄时, 果然南进而不敢北进)。他大受震动, 从此将日本视作中国国防的最大敌人。

东北为日、俄相争之地, 是中国的第一线国防区域。蒋百里 1906 年学成归国后, 浙江巡抚张曾敷请他留乡练兵, 他却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约, 去东北督练新军, 试图将其筹建国防的志愿先在东北付诸现实。但由于旧军排挤, 他任职三月即转赴德国继续深造。1910 年留德归来后, 他先是供职于清廷禁卫军训练大臣良弼, 深为倚重, 不久赵尔巽奏调他仍回东三省练兵, 他毅然赴任, 继续其未竟之业, “百里到东北后的第一课, 就是建立东北第一线国防, 这是他生平最快意的工作, 也是他最拿手的工作”^{[4] (P31)}。在赵尔巽的大力支持下, 他制定出东北国防建设的诸多方案, 亲自主持防日的诸项举措, 另把与其仅一面之交而有志国防建设的李小川请调来奉天, 筹备防俄国防事宜。后来有人以为蒋百里这样做, 是因为“他对日本军事和其对中国侵略的野心了如指掌, 但对俄国尚欠充分的认识”^[17]。这种误解是由于未见及

上述蒋百里刊于《浙江潮》上有关俄国研究的文章, 也未注意到日俄战争前后蒋百里国防防御对象的转移。事实上, 自这场战争后直到 30 年代, 在蒋百里的国防设想中, 日本已经取代俄国成为对中国最有威胁的假想敌。因此, 他深入研究中外军事理论和国防问题, 逐步构建起以抵御日本侵略为首要目标、以“国防经济学”和“国家总动员”为主要内容的“全体性国防”理论, 最终为中国的国防建设和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18]。

参 考 文 献

- [1] 蒋百里口述, 张禾草记录, 蒋百里自传遗稿 [A]. 黄萍荪, 张禾草, 蒋百里抗战论集 [C]. 金华: 新阵地图书社, 1939
- [2] 蒋复璁. 先叔百里公年表 [A]. 蒋百里全集 (第六辑) [C]. 台北: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
- [3] 百里. 是不是奢侈的装饰品 [J]. 改造 (第四卷一号)
- [4] 陶菊隐. 蒋百里先生传 [M]. 上海: 上海中华书局, 1948.
- [5] 曾业英. 蔡松坡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6] 刘成禺. 世载堂杂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7] 冯自由. 革命逸史 (初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8] 浙江潮发刊词. 章程 [J]. 浙江潮, 第一期.
- [9] 余一 (蒋百里). 民族主义论 [J]. 浙江潮, 第一、二、五期.
- [10] 飞生 (蒋百里). 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 [J]. 浙江潮, 第八、九期.
- [11] 飞生. 军国民之教育 [J]. 新民丛报, 第 22 号.
- [12] 飞生. 真军人 [J]. 浙江潮, 第三期.
- [13] 杨天石, 王学庄. 拒俄运动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 [14] 飞生. 国魂篇 [J]. 浙江潮, 第一期.
- [15] 飞生. 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 [J]. 浙江潮, 第一、二期.
- [16] 飞生. 俄人之性质 [J]. 浙江潮, 第一、二期.
- [17] 薛光前. 蒋百里先生的军事思想 [J]. 传记文学 (台北), 第十五卷二期.
- [18] 吴仰湘. 蒋百里国防理论研究 [R]. 武汉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 2002.